

嵌入与引领: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

喻丽果,赵平*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智媒时代,智能媒体的普及和发展已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新变量。智能媒体对话语主体、话语传播和话语空间的赋能,提升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精准度、亲和力以及影响力。但同时智能媒体的发展也使得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受众本位”解构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权威、“信息茧房”阻隔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传播,“算法黑箱”恶化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环境。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价值认同,重塑话语权;创新技术赋能,畅通话语传播渠道;加强技术规制,净化重构话语环境,以引领智能媒体,加强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

关键词: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25)01-0066-07

DOI:10.20060/j.cnki.ISSN1009-3222.2025.0066

习近平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1]随着智能媒体的普及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是话语主体根据时代境遇和实践场域的变化而设置话语主题,凭借自身的理论特质和现实影响力进行爱国主义话语生产、传播及其体系建构,并对人们的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等价值取向进行解释、规范和统领的权力和效力。智能媒体催生了新的话语样态,各种异质社会思潮迭起,使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和运用智能媒体的特点和优势,切实推动智能媒体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同频共振,实现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时代建构,是我们党亟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

1 “智”造机遇: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发展契机

智能媒体与算法科技相互嵌入,重塑着爱

国主义话语权的内在结构与现实场域。质言之,媒体的智能化赋能为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了全新场景,不仅使爱国主义话语权嵌入算法成为可能,还为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发展契机。

1.1 话语主体赋能:提升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精准度

话语主体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主体在具备主体意识的同时,也需要具备话语创造、话语管理与话语表达的素养。智能媒体是集“智能+智慧”于一体的新型媒体,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将其应用于信息传播领域的媒体形态。智能媒体的赋能,大大提升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传播的精准度,推动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如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还依托其强大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功能,对信息流进行技术赋权,从而介入到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智能传播场域中。^[2]

收稿日期:2024-07-12

通信作者:赵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统美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E-mail:zhaopin3180@sina.com

一方面,智能媒体的发展推动了多维话语主体互动模式的发展。智能媒体的本质是负载价值的技术工具,能精准地筛选出话语主体的话语习惯,并依托算法连接的用户关系,及时将主流价值观分发推送给话语主体,以实现对话语主体的赋能。话语主体的赋能,改变了传统“传者本位”的话语主体结构,“人机互动”的多维话语主体互动模式得以形成。网络爱国主义话语凭借智能媒体进行数据的“转码”“解码”,形成符合大众价值取向和兴趣偏好的具象化“数字画像”,话语主体可据此适时地调整话语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促成活动进行精准信息推送,进一步助推话语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另一方面,智能媒体的发展推动了话语主体多元化的形成。智媒时代万物皆媒,由智能媒体构筑的虚拟场域以其低水平的准入门槛使得网民群体都能够成为表达爱国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主体。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主体队伍中,每一话语主体既是主流价值观的接收者也是发射源。智能媒体之所以“智能”,是因为其能深入了解话语主体内心需求,提供多种契合话语主体“精神图景”的话语生产模式。基于话语内容推送的智能化,拥有相似兴趣爱好、价值认知和思想情感的主体会相互黏合、相互聚合,从而形成一个个共情、共通、共鸣的虚拟社群。同时,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传播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多元化的话语主体与“意见领袖”借以独特视角对不良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及时过滤不良信息,并凭借其强烈的感染力和扩散能力引导大众厘清网络喧嚣背后的意识形态,大大提升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精准度。

1.2 话语传播赋能:提升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亲和力

话语传播是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关键环节,系统回答了“怎么传播”的问题。话语体系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得切实提升话语传播能力。话语传播承担着网络爱国主义话语内容呈现的建构功能,智能媒体对传统信息

分发机制的解构,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传播的亲和力。

一方面,智能媒体集“双向交互+智能引擎”于一体,推动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传播。在融媒体时代,话语主体作为话语的生产者控制了话语的加工处理过程,话语受众只能单向地接受话语主体投递的话语内容。智媒时代,基于大数据对话语传播的赋能,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距离被拉近,过去单向化、中心化的传播格局渐趋扁平化、去中心化。^[3]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不仅是网络空间的信息容器,更是人们在网络生活中爱国主义情感、思想认知及爱国主义价值诉求的载体。智能媒体的赋能,为话语主体创造了更为便捷高效的爱国主义情感表达渠道,极大地增强了话语表达的协同性。

另一方面,智能媒体集虚拟与现实于一体,使得爱国主义话语更具“温度”。跳脱出传统爱国主义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呈现的宏观、理性与结构化表达方式,智能媒体的赋能,进一步拉近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传播过程中,算法推荐技术的智能辅助使得大量“懂你”的话语直抵受众心中,真正实现了大水漫灌向分众精准滴灌的转变。当前,众多话语主体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上对爱国主义话语进行解读或重新编码,塑造出爱国主义话语微观化、大众化、形而下的生活化状态,并在这一过程中极易形成价值共鸣与情感共振。在新兴技术的赋能下,网络爱国主义话语跨越了传统爱国主义话语严肃表达与单向传播之间的鸿沟,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3 话语空间赋能:提升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影响力

“话语空间即话语场域,是指人们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符号空间、符号场”^[4]。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空间可以理解为在跨越时空背景中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媒介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彰显爱国主义情怀,宣讲中华文化的沟通交流场域。在智能交互技术

的助力下,“通过呈现逼真场景和进行人机互动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重构”^[5],跨越了话语表达原有的时空界限,增加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扩散度和影响力。

同时,智能媒体的发展使得话语空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即由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话语空间取代原有的官方话语为主导的局面,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作为智媒时代话语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呈现出了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民间话语以社交媒体为载体,逐渐渗入受众脑海;官方话语改变了传统的“拟态环境”,使得话语受众能自觉接受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价值引导,从而增强对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点赞中国航天”,共青团中央发布的“梁家河全景带你走进青年习近平”等,为话语受众带来全方位和立体化的沉浸式体验。

智媒时代,网络场域成为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全新场域。为精准迎合受众的话语习惯,智能媒体深度赋能不仅突破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传播过程中地域限制与兴趣不契合的梗阻,而且从海量内容池中抓取同质话语内容进行话语空间的精细划分,满足了多元化的话语交流诉求。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话语空间势必被分解成若干话语主体,每个话语主体都有着自身所持有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为增强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辐射力度,话语主体可借助智能媒体的话语空间划分功能,进而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话语受众的话语标签聚类,以此有效拓展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辐射范围,提升其话语影响力。

2 暗藏“危”机: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潜在风险

尼采·波斯曼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6]。智能媒体亦是如此,为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带来全新机遇的同时,“受众本位”“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给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带来诸多风险挑战。

2.1 “受众本位”解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

话语权威是网络爱国主义话语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基本保障。数字智能技术重塑社会交往活动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威被解构的风险。“受众本位”是指以受众为中心,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满足受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需要。人不仅是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主体,而且也是话语权的客体。但智能媒体的发展引发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去中心化”特征也带来了突出的人机矛盾。

话语权的让渡蚕食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议题设置的主导权和实效性。在万物皆媒、算法当道的智媒时代,把控议题设置的一方往往能在情感认同和价值引领上占据先发优势。但智能媒体强化了网络的“去中心化”导向,话语权和议题设置权的泛化使得传统的一元化价值中心不断被弱化消解。“不设限”的网络话语空间将人们身上的“枷锁”打碎,话语权前所未有地被放大,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在虚拟场域中也能“大胆发声”。智能媒体的赋权使得社会大众以平等的姿态进入话语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大众凭借网络的低门槛与开放性等特征,或成为某种观点的发言人、代言人,或是仅从自身利益角度在网络空间中大放厥词,引发舆论冲突和话语漏洞,致使话语主体的话语权被削弱。

“个人偏好”内容挤占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生长空间。算法悄无声息地干预人的判断和偏好,基于“受众本位”的算法推送话语把关人成为“迎合者”。在传统的舆论场域中,决定爱国主义话语权传播的“把关人”一般由官方媒体担任。而在智媒时代,智能算法逐渐成为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把关人”。互联网等同于一张“去中心化”的蜘蛛网,人人都可以是网上的节点,话语传播者与话语受众之间无明显的界限。智能算法“千人千面”的偏好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如果话语把关权和议题设置权以收割流量、博人眼球和增强黏性为目的,极易使更多情感取悦类话语进入大众视野。在扁平化的网络爱国主义

话语的传播业态下,智能媒体更加注重大众的个人偏好而非爱国主义话语本身的价值内涵,在鱼龙混杂的价值喧嚣中,极易消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权威性。

2.2 “信息茧房”阻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传播

话语传播是生成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良好的话语传播力,才能牢牢掌握话语权。在智能媒体的双向赋权下,“信息茧房”效应不断加剧,阻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传播。“信息茧房”最先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意指“网络虽然能带来更便捷的信息搜索,但公众长期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7]。智能媒体依托算法精准推送符合受众个性化偏好的话语内容,意味着会始终将同质的话语内容推送给话语受众,为其营造较为狭窄封闭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环境。

信息窄化降低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内容传播的全面性。受“信息茧房”的影响,人们完全凭兴趣爱好筛选话语内容,将话语内容局限于自身所期待的特定类型和特定范围内。长此以往,话语受众在“茧房”内选择和接收大量同质化的话语内容,不仅窄化了自身的话语获取范围,且自身的认知视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极易因话语供给不全面或供给偏差而对爱国主义产生片面认知甚至错误理解。爱国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智能媒体为话语受众的话语选择自由提供了现实可能,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屏蔽兴趣以外的话语内容,导致其他优质的话语内容被排斥或忽视,从而影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传播。

圈层壁垒消解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认同度。当身处“茧房”中的话语受众与有着相同价值立场或兴趣爱好的人相遇,就会组建成结构封闭、信息加密的圈层。“圈内同质化、圈外异质化”的圈层传播结构,增大了圈层间话语受众的话语沟通难度。每一圈层都有着自己的话语加密方式,“茧房”的阻隔会影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传播。

话语的“入圈”。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传播过程本质上是实现爱国主义话语大众化的过程,大众化意味着各网民共同认可其内在的价值观念。然而,在此起彼伏的数字舆论场中,话语壁垒增大了圈层内外话语受众的沟通障碍,干扰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传播,从而也消解了圈层成员对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理解和认同。

2.3 “算法黑箱”恶化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环境

构建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话语环境建设是关键。话语环境是指围绕并影响话语权建构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在智媒时代,开放包容的话语环境是实现平等对话、互动交流的重要条件之一。作为控制论中的概念,“算法黑箱”意指智能算法运行机制下算法信息传播诸环节中不可见的过程。“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极易滋生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价值偏向,其“黑箱”效应也使得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话语环境更趋复杂。

“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侵蚀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合法性根基。公开透明是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根基,而智能媒体中“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特质会为不良社会思潮提供隐匿之所,恶化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话语环境。各种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相悖的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及泛娱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暗流涌动,与建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要求背道而驰。如“算法黑箱”技术逻辑衍生的网络民粹主义等思潮,借助激情和盲从将话语受众推离理性的轨道,将爱国主义情感表达放置在非理性、浮躁和偏激情绪之上,潜在地削弱了受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认同,使其在潜意识中褪去对爱国主义的整体认知。“算法黑箱”的存在将话语主体的话语表达诉求与话语吸收反馈的能力全部掩埋,极易引发受众对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过程的公开性与科学性的担忧与质疑。

“算法黑箱”的价值偏向催生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公正性危机。算法系统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黑箱”,极易成为智能算法价值偏向的“隐身衣”和“遮羞袍”。一方面,受话语

主体自身所固有价值偏向的影响,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过程中,话语主体往往会通过一系列暗箱操作将自身的价值立场渗透给话语受众,使得智能算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话语主体的价值偏向。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智能算法技术上拥有非对称性优势,其基于“算法黑箱”的个性推介助推着话语操纵与价值输出,甚至对我国网络爱国主义话语内容进行歪曲解读与肆意“魔改”。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ChatGPT 存有“算法黑箱”和数据偏见的技术瑕疵,其本身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特别是拟人化的话语风格使得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具隐秘性,如果放任其自由传播,极易弱化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思想引领作用,进而影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

3 化“智”为“治”: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调适进路

传统媒介的智能化变革改变了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生产、管理与传播的媒介生态结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时代建构必须主动把握数字化发展的大势,进一步推进智能媒体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双向嵌入与互融联动。

3.1 深化价值认同,规避算法越位风险

智媒时代,智能媒体是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主阵地。西方敌对势力鉴于网络的低门槛与开放性等特点,在网络空间歪曲事实、弱化爱国情感,加之智媒环境下各种社会思潮泛滥,对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了冲击,因此深化价值认同对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至关重要。智能媒体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深度融合关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深化价值认同,强化价值引领,规避智能媒介技术异化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

一是激活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内生发展动力。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权威地位,牢牢将马克思主义细微融渗到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宏大叙事中,力争在网络领域进一步厚植话语受众的家国情怀和筑

牢爱国主义价值共振的根基。“智能媒体的数据筛选与算法推送更加推进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与应用,既能观照人们的认知习惯与情感需求,更能有效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渗透与信仰攻击”^[8],确保整个网络空间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持续稳定的生成。同时,要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引导网络爱国主义话语在网络空间的生产与传播,提高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政治站位。

二是坚定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参与主体的价值认知。网络空间中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参与主体是真实的“社会存在”。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操控下,参与主体在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方面的参差不齐,使其极易成为异质社会思潮渗透的切入点。因而,在深化价值认同的过程中,既要关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参与主体的价值认知,也要关照智能媒体在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过程中带来的冲击。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9]。在面对由资本逻辑利益趋向所引发的多元话语冲突时,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参与主体既要增强网络爱国主义意识,勇于发声、敢于亮剑,也要以铿锵有力的话语正面回应不良社会思潮,深化价值认同,重塑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威。

3.2 创新技术赋能,畅话语传播渠道

畅话语传播渠道是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环节,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关键一招。智能媒体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是不断适配、相互发展的过程,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得以完善。此外,智能媒体技术的普及在为多数话语受众的政治表达和观念传播提供渠道的同时,也阻碍了受众话语接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因此,必须创新技术赋能,畅话语传播渠道,以提升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效度。

一是打破圈层话语壁垒,建构话语传播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要打造新型传播平台,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

入”^[10]。要借助智能媒体的系统整合性、立体性及双向互动性等优势,建构话语传播共同体来打破圈层话语壁垒。要创新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议题设置。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始终与权力相随,能否拥有议题设置权,成为检验拥有话语权的基本参照。为此,要以技术的转型升级创新议题设置,使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通过智能技术走进受众心中,提升受众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二是加快开发核心技术,规范国际传播新秩序。智能媒体技术的发展助推社会由“原子世界”加速向“比特化世界”转化,得以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鸿沟”不断扩大。习近平强调:“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1]。要利用智能技术创新话语权建构的方式方法。话语主体要积极推动智能技术融入话语权建构的全过程,通过算法推荐、深度学习等技术精准预判和处理话语权建构的风险,以切实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话语主体要加快开发核心技术,整合声音多头、资源分散的国际传播局面;发挥多主体的联动力量,优化国际传播的话语表述与叙事方式,鼓励支持并引导话语主体在更多更广更高层次的国际话语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3.3 加强技术规制,净化重构话语环境

话语环境是影响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外源性因素。随着大数据、智能媒体等新技术的发展,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博弈场地由现实社会转向网络社会,新技术的赋能为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座驾”,但同时也存在技术隐忧。为此,必须加强技术规制,净化重构话语环境,坚决抵制错误社会思潮的侵袭和渗透。

一是完善网络立法机制。对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及泛娱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进行法律规制,目的在于科学防范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新风险,从而将其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目前我国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

法》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有效防范了在赋能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过程中的价值扭曲和伦理异化。但智能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现有法律法规的诠释力和适用性仍有待加强。为此,一方面,应加强对智能媒体技术运用的立法工作,弥合技术规制的空白与间隙。要进一步健全集舆论导向、风险预警及话语应急等机制于一体的网络相关立法,有效打击和惩处运用智能媒体技术致使网络话语失范、舆论失真、舆情失控等行为的话语主体。另一方面,应完善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法治保障体系。应把智能媒体与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规律相结合,以确保智能媒体技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发挥赋能作用,并对被不良社会思潮所困扰的话语受众进行法律保护。

二是消除网络灰色地带。智能媒体从来不是客观公正的代表,它的每一种技术架构及每一个界面都隐藏着意识形态属性。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具有法律的底线和自由的边界。面对复杂多样的网络话语环境,一方面,话语主体不仅要以技术优化增强智能媒体的透明度,提升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并引导智能媒体自身逻辑推演的内部可释性;更要在智能媒体新技术的加持下,制定网络话语的规则框架和规范路径,自觉抵制低俗化、庸俗化甚至恶俗化的不良话语。另一方面,话语主体要增强自身的法治观念,提升自身的话语素养。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技术只是人认识社会的手段与工具,因而,话语主体要提升运用法治思维与新技术解决话语失范等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对各类失德、违法违规的不良话语加以有效地引导与规制,为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权的建构创设良好的话语生态。

4 结语

爱国主义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议题,智媒时代网络爱国主义话语的发展也要求话语主体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以更具感染力、渲染性、生动性的话语形式激活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网络爱国主义话语是育人活动顺利开展的媒介,

也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稳步推进的手段。所以,要努力探索适应时代的话语叙事方式,将主流价值观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传播爱国主义,弘扬主流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4.
- [2]向继友,吴学琴.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策略[J].江汉论坛,2023(12):53-59.
- [3]黄家康,李红革.人工智能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及其风险应对[J].理论导刊,2023(6):54-59,88.
- [4]杨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话语空间博弈与话语供给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4):94-100.
- [5]刘新刚,裴振磊.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考察——以马克思现实人理论为视角[J].思想教育研究,2017(9):57-61.
- [6]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 [7]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M].毕竟锐,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
- [8]杜艳.新时代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样态与实践要略[J].重庆社会科学,2023(12):115-127.
-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8.
- [10]习近平.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1).
- [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立体全面的中国[N].人民日报,2021-06-02(1).

(编辑:曹明倩 王天琪)

Embedding and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Patriotism Discourse Power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YU Liguo, ZHAO P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edia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nd has become a new variable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power. The empowerment of intelligent media on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 space has improved the accuracy, affinity and influence of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edia has also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power face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is, the “audience-orientation” deconstructing the authority of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the “information cocoon” block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and the “algorithm black box” deteriorating the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hape the authority of discourse by deepening the value identity; Innovativ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smooth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Strengthen technical regulation, purify and reconstruct the discourse environment, realize the guidance and domestication of intelligent media,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patriotic discourse power.

KEYWORDS: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online patriotism discourse power; dominant ideology;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risk governance